

成都文史资料

1989年第4辑（总第25辑）

目 录

· 革命楷模 ·

统战工作和民主运动的杰出战士李相符教授……李实育（ 1 ）

· 光明之路 ·

邓锡侯被蒋撤职和毅然起义前后……陈懋鯤（ 25 ）

俞飞鹏入川催粮与邓锡侯晋京去职……陈开国（ 41 ）

· 巴蜀风云 ·

“四九”学生运动在川大的始末……邓祥裔（ 53 ）

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反蒋倒王斗争……张惠昌（ 77 ）

· 进步报刊 ·

战斗的《西方日报》 杨正南 (102)

· 金融史记 ·

民国时代成都金融实况概述 (下)

.....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12)

..... 成都市民建会、工商联史料委员会

经营族昌商业银行的苦痛回忆 米庆云 (156)

· 补 正 ·

对《国民党西康省政府起义后的重大波折》一文的补正

..... 张永春 (178)

附 录

《成都文史资料》总第十八辑至二十四辑目录 (180)

本刊重要启事 (188)

统战工作和民主运动的杰出战士

李相符教授

李实育

李相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又是著名的林业科学家和教授。他从1931年起，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的同时，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尤其在在我国艰苦抗战直至胜利的时期，并且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大后方，致地下工作极为艰难的时期，他在成都以秘密党员的使命，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指示，与其他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一道，对地方实力派、民盟和民协组织，特别是青运、学运，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成都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局面得以好转。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生，不少都是由他倾注了心血，在他的影响下成长直至参加革命的。因此，在相符老师、同志已去世25年的今天，大家每回忆起他时，都是肃然起敬的。

一、他在青少年时代

李相符1905年生于安徽桐城。幼年家贫好学，其叔爱之，延师授读。叔名李光炯，前清举人，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满腔热血，爱国爱民。曾亲为子侄辈讲授正气歌，相符深受感染启迪，竟至毕生不忘。

注：本文作者李实育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系四川大学学生，民盟盟员；解放后在西南政法学院工作，现已离休。

1919年，他才15岁，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竟被桐城中学开除。这年秋，转学到富有革命传统的芜湖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其叔曾任校长，柏文蔚曾任体育教员，陈独秀任历史教员。李相符在校时，班上的前后两个国文老师（吴通生和郝耕田）都和陈独秀是战友。加上当时芜湖是安徽新文化的中心，高语罕（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就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不断高涨，年轻的相符也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了这些斗争。

1922年，李相符考入山东农业专门学校，1925年“五四”惨案时，他已是济南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组织声援，积极投入这次反帝爱国运动，为山东军阀张宗昌追捕而被迫东渡日本。

1926年2月，李相符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当时，国内北伐革命刚开始，他是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怀着火热的心情，注视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并组建了国民党北海道支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李相符愤而退出国民党，在他的影响下，北海道支部亦自行宣告解散，同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宣言。

不久，李相符和东京中国共产党留日总支部取得了联系，于1928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积极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在北海道的支部，并被选为支部书记。1929年李相符在“帝大”毕业后，到了东京，主要负责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社研”是中共的外围组织，遍及日本各大城市，参加的进步青年200多人，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同年10月，东京中共组织遭破坏，他不幸被捕入狱，忍受了日本特高课的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坚贞品质。直到1931年出狱后始回国，在组织的领导下，他以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出任上海劳动大学副教授并担

任上海左翼文化同盟执委。后相继转任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

二、他在抗日战争年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以武汉大学林学系教授兼平汉铁路林场总场（场址设在鸡公山）场长身份，遵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党的统战关系和社会关系，先后担任了第一战区豫南民运专员、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在豫鄂边，组织民众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武汉、信阳失守后，“抗敌工作委员会”活动重心移驻大洪山一带，在随县、钟祥、京山、应城各重要村镇（政治部设均川镇）纷纷建立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民主政权。那时，陶铸同志便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这里，作为党和抗敌委员会的联系人，被聘为抗敌委员会的名誉顾问，他也就在多种公开的会议中，介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1939年2月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一部进入豫鄂边敌后，和狠狠地打击日寇创造了条件。进而在武汉外围，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李相符在抗敌委员会辛勤地工作，经受了锻炼，参与为党培养出大批干部投入火热的抗敌斗争中。不久，因国民党搞摩擦，宣布解散该抗敌工作委员会后，他被迫离开豫鄂边区，于1939年4月到了重庆，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见到董必武同志。本来他是准备去延安的，党组织把他留下来治病。原来他在抗日战争发生后，因生活艰苦，工作劳累，突然全身发黄，在豫鄂边区，没有治疗机会，健康情况日益不好。因此到重庆后，最初被安排在歌乐山的宽仁医院，不见疗效，1940年初，又经该医院转介到成都三大学（华西、中央、齐鲁）联合医院。不久，陶铸北上路经成都时，特来看望他，见其病仍无起色（其实直到他去世时

亦未获根治），医院也认为是一种罕见的溶血性黄疸病，考虑到他不宜去延安，因此经党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成都。

国民党当局在成都制造了春荒“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地下党，借以掀起反共高潮，大搞白色恐怖。中共川康特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加紧撤退和转移干部。李相符来到蓉城，他的党组织关系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比较安全的。1940年8月，他受聘为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有此身份作掩护，便给他创造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但当时地下党组织已遭破坏，在白区的统战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参见1940年党中央“五四指示”），因此党中央交与他的任务，主要就是做上层统战工作。这年秋天，董老路过成都，又与他见了面，也交待了这项任务。此后他在成都的6年里，始终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经常的秘密联系，由于能够及时得到党的指示和支持，工作得以稳步开展，而且卓有成效。

（一）参与组建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团结川康地方实力派。

中共中央对川康军政人员特别是刘文辉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工作，在李相符未来成都以前，已经多渠道地进行过许多了，包括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对刘的会见。因此相符同志留在成都以后，就继续参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各方面的进步同志共同努力，于1941年就通过地方实力派刘文辉为首，组成了有成都各大学进步学者、教授、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

刘文辉生前自撰“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基础上，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日益密切。1941年春，我和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马哲民等，研究如何在后方民主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大家都认为有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

团体的必要，经过几度商量，决定成立‘唯民社’。在成都邵石痴（是我与进步人士联系的代表）家开成立会。通过的宗旨为：

‘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社委员会推选刘文辉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社的经费由刘文辉筹措。参加的社员有邓初民、杨伯恺、朱蕴山、沈志远、黄宪章等30余人。‘唯民社’主要通过文化工作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半月刊、《民众时报》、《华西晚报》等等，分别由邓初民、沈志远、马哲民、李相符、黄宪章主编，在成渝两地出版，以揭露蒋政权的反动罪恶，推动后方民主运动，争取学术自由，团结进步青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此外，在重庆还办了‘文化出版社’，在成都办了‘大学书店’，以印刷和供应进步书刊。1945年10月，‘民主同盟’临全大会以后，我们认为‘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的政治纲领内，同时该社的主要负责人又大都参加了民盟，并且有不少人被选为民盟中委或民盟四川省委，我们这个政治团体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乃于这年底停止了组织活动。”

从以上一些情况中，已可看出“唯民社”实际上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之一。李相符同志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对当时在蓉的著名爱国老人张澜先生十分尊重，取得了张老的大力支持。“唯民社”从1941年春成立到1945年底结束的5年中，对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由皖南事变到旧政协召开）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譬如：

1、通过“唯民社”，加强了中共对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川康将领的统战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和掩护。而蒋介石在始终未忘记反共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异己的地方势力派。在历史上曾公开反蒋拒

蒋的刘文辉，随时感到生存上的威胁（注2），也需要进步势力和民主力量的帮助，因而他对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和民主政治，防止蒋介石妥协降日，反对蒋的独裁统治和排除异己等，都积极赞成，很支持“唯民社”在国统区开展爱国民主活动。为此，他不仅给“唯民社”提供活动经费，有时社办《大学月刊》编委开会，他都亲自参加，听取汇报；有时还请“唯民社”的学者、教授给他讲课或者分析形势，以增益见闻；当国内外出现重大问题需要有所决策的时候，他则要召集“唯民社”有关人士共商意见，集思广益（注3）。的确，刘文辉支持了“唯民社”，掩护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唯民社”也帮助了刘。他能一步一步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正是包括中共和“唯民社”在内的多方面力量进行工作共同促成的。而李相符在“唯民社”活动几年中，善于与刘文辉合作共事，并且解放以后二人又同在林业部工作，继续合作共事，决非偶然。

2. 通过“唯民社”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版了几种进步报刊，对西南民主运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仅以两个刊物为例：

（1）《大学月刊》。这是“唯民社”的机关刊物，1941年春“唯民社”成立后即开始出版发行，当时在各大学以及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李相符和马哲民、沈志远、陈仲凡、邓初民、杨伯恺、黄宪章为编委委员（主编先后是马与沈）。办这个刊物就是以反对独裁统治，争取学术自由，推动民主运动为主旨。一直到1946年内迁后方各大学相继东迁、北上复员为止，每期千份，坚持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等主要城市发行销售。它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所形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逐步开拓了舆论阵地，也呼唤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形成了蒋管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唯民社”在成立时社员只有30余人，但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仅所办《大学月刊》社的社

员已达70多人，且十分之七、八都是大学教授（注4），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后来一部分社员加入了民盟，成为领导骨干（盟的中委或省支部委员），还有一部分社员，则成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的中坚力量，团结了更多知识分子，为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2. 《青年园地》半月刊。其主要对象是青年知识分子，由于这个阶层历来都起着重要作用，李相符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还自兼了青年园地社的社长。这个半月刊也是“唯民社”的机关刊物，它与《大学月刊》同步发行，为当时知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公开读物。参加社里工作的亦多为成都各大学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协”成员，编辑部负责人先后有韩述之、吴寄寒、黄药眠、王晶珪、刘明章等。它的宗旨是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后方广大青年，推动成都地区青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其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李相符把《青年园地》的工作与中共成都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由于“民协”乃是在相符同志的关怀、支持下成立起来的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因此它的部份负责人又被李相符吸收在《青年园地》承担了任务。这二者的目标当然是统一的。《青年园地》既是当时学运工作的宣传阵地，也是“民协”在组织上的据点之一。社址最初设在刘文辉的代表、进步人士邵石痴家，后则迁至东大街和丝棉街两处，在1945年——1946年间，成为进步青年组织开会和接头的地方（注5）。因为这些特殊条件的配合，才促成了当时成都青运学运工作的迅速展开。

（二）具体指导、支持和帮助“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组织领导波澜壮阔的青年学生运动。

“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是在前述“抢米事件”以后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中共的外围地下组织。当时由于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部分留在成都和外地转移

来蓉均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以及拥护党的积极份子，带着渴望寻找党和重新起来斗争的心情，逐步汇聚在一起，结成秘密革命社团，开始于1942年，名叫“蓉社”，只有6人。1943年春改为“马克思主义小组”，同年冬增加到14人，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1944年春夏，为了防止敌特破坏，该会曾经暂时停止活动，继而由核心成员王晶珪、王文星、黄寿金、崔巍组成四人秘密小组，即开始与李相符联系，取得了他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又继续向社会各方面坚持进行活动。是年秋形势转变，才恢复了“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带头与其它进步社会团体发起，于10月7日在成都华西坝举行“国是座谈会”，邀请张澜等7位国民参政员公开讲演，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打破了当局在大后方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后的沉寂局面。此后，会员发展到19人，并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在李相符的关怀支持下，10月15日即在成都文殊院的树林里正式成立，定名为“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紧跟着便从声援“市中事件”（抗议政府当局镇压学潮）着手，首先组织发动了促进西南地区学运走向高潮的第一声春雷——“双十一运动”。其后，不断组织领导着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每次运动，都是在相符同志的亲切关怀、倾注心血和直接参加指导下进行的。“民协”组织在这些斗争中也不断壮大，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8人，1946年内迁院校复员返迁后发展到300多人，培养了一批在各条战线上忠于共产党，忠于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优秀骨干。迄今，一部份已离休，还有部份仍在领导岗位。当年这些青年同志对李相符老同志都是深深怀念的，敬佩他为革命不懈斗争的坚定精神和光辉事迹。譬如“民协”早期的主要负责人王晶珪（当时燕京大学学生）称赞他“对成都青年运动作了最多的、直接的支持。”（注6）“民协后期的主要负责人王宇光（当时金陵大学学生）这样肯定道：“川大教授、地下党员李

相符同志，以民盟中委兼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的身份公开活动，通过川大民协，对民协的活动以及1944—1946年成都历次的学生运动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注7）当年“民协”负责人之一彭塞（当时华西大学学生）亦提到：“李相符同志对成都的民主运动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原“民协”负责人之一，现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陈鼎文（当时燕大学生）也赞扬说：“相符同志对现实形势分析准确，善于发动群众，打开局面，”“革命性坚强。”“民协”众多同志对相符同志的高度评价，是有以下大量事实为依据的。

1. 他为成都“民协”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民协”正式成立前的1944年春，其前身“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因面临白色恐怖而一度停止后，它的核心“四人小组”，经同具有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李相符联系请教后，在他的关注和帮助下，始又继续坚持斗争。因相符同志能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加上他在组织工作、青运工作和统战工作上的长期经验，以及他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唯民社”已有工作基础，都给“民协”的成立和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他安排了“民协”一些主要成员到“唯民社”办的青年园地半月刊，有王晶珪、刘明章等担任过主编，崔巍、卞仲耘、李静准（李吉均）、刘继祖、商韬、陈鼎文、孙跃冬等也分担过各项工作。他们就在相符同志的直接关照支持下，使“民协”的工作与“唯民社”的活动挂了钩，从而就在政治上得到掩护，经济上得到赞助，同时也为“民协”提供了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阵地，有利于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2. 他指导、帮助“民协”打开成都青年学生运动的新局面。

1944年10月31日，“民协”刚成立半月就面临着成都“市中事件”的爆发。当天，在这所国民党控制极严，并无一个共产党员或“民协”成员的中学，却自发地展开了学生追查校方在伙食

管理上循私舞弊、虐待青少年学生，进而反对政府当局的斗争。一开始学校当局就恼羞成怒地寻找借口，挂牌要开除闹事的三个学生，导致罢课事件。接着找来教育厅官员到校训话、查处，引起学生愤怒地反驳质问校方和政府当局，并抢夺共派人在现场记录发言学生姓名情况的笔记本。继而教育厅官员和校长竟向市长余中英打电话，诬告说：“市中学生要暴动……”。余中英急命警察局长方超率领大批警察包围了该校，学生们也聚集起来与警察对峙，质问和斥责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们来干什么？”“有能耐上前线去，别在这儿耍威风。”方超暴跳如雷，立即指挥成群的警察冲向学生们，举起枪托、藤条乱打。把手无寸铁的许多中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一些警察还乘机侮辱、猥亵女学生，顿时一片惨叫声、痛哭声。致轻伤30余人，重伤10余人，旋即又逮捕、囚禁44人，造成全市震惊的“十·卅一惨案”。这一严重事件，激起了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及家长、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进行了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声援等活动，全城呼吁：“救救市中受难的子女、弟弟妹妹们！”

群众行动起来了，就迫切需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力量。但当时成都的地下党组织还没有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下恢复过来。在这关键时刻，李相符和在蓉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立即站了出来，依靠和帮助已经建立起来的“民协”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抓住声援市中学生正义斗争的良好战机，打开青运、学运的新局面。很快就着手组织领导了称为“双十一运动”的青年学生群众运动。即在11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有7000多大中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答允了学生们提出的4个正当条件，把余中英、方超撤了职。此次运动的全过程表明，李相符同志实际上是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直接参加了“民协”为开展运动所进行的多次大、小型

秘密会议，作出决策安排，也包括斗争胜利结束后“民协”在百花潭王家花园举行的经验总结会议，讨论巩固这次胜利和扩大“民协”组织等问题，他都亲临具体指导进行。不仅如此，他还自始至终由内及外，以自己在民盟和社会的广泛联系，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密切配合，有力地支援了这次斗争直至胜利。譬如“市中惨案”一发生，他就和党内、盟内以及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叶圣陶、杨伯恺、马哲民、沈志远、田一平、黄药眠、李劫人、贺孟斧等52人联名，公开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呼吁声援被害学生。他还通过“民盟”主办的《华西晚报》（发行人：罗忠信，经理：田一平）及《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总编辑：吴汉家）详细地报导了警察的暴行和学生的正义行动，造成舆论声势，援助了此一斗争。特别是他还考虑到这是革命力量长期隐蔽以后第一次开展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为了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敌特破坏，便通过“民盟”的关系，取得当时担负成都警备任务的川军第164师师长彭光汉（盟员）的支持，在会场周围及游行所经路线，派出军队保护。这一安全措施，既鼓舞了斗志，也确保了集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

“双十二运动”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黑暗专横统治，激起强烈反抗，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标志着成都的反蒋民主斗争从此逐步走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称之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钱瑛同志称之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无疑，李相符同志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3. 他对川大“民协”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更直接、更具体。四川大学的“民协”组织也是1944年秋由李相符教授亲自约集10多位进步学生筹商建立的。他非常重视学校“民协”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期的“民协”骨干，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在李相符同志亲自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指导他们的理论学习，参加

他们的时事讨论，并曾邀请中共南方局派来成都的张友渔同志为“民协”同学作形势报告，鼓舞大家的战斗意志。他还邀请从延安来川的新华社记者杨慧琳（女）给“民协”同学介绍延安整风情况、大生产运动，讲解一些革命道理以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等，对大家启发尤大。他还教给大家革命斗争的策略与办法，帮助大家总结斗争经验，强调要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团结更广泛的同学参加斗争等等。川大“民协”所领导的重要的爱国民主斗争，他更是亲自参加，具体指导。大家回忆起相符同志的时候，总是怀着十分敬仰、激动的心情。譬如卢昌邦同学提到：

“我被选为川大‘民协’的组织委员，为日常工作经常到相符老师家汇报请教。‘民协’领导骨干的秘密会议都在他家角楼上召开，川大‘民协’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茁壮成长。”刘承俊、赵锡华等同学也都谈到：“相符教授积极、热情、坚韧、顽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川大，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共成都市委在川大的基层组织尚未恢复前，由‘民协’组织和领导的川大学生运动，是在李相符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川大铎园四号的住宅，可以说就是成都地区‘民协’和学生运动的地下司令部。在校外的‘民协’领导成员王煜（王宇光，金陵大学）、李中、陈鼎文（燕京大学）等同学都常来找李先生。川大‘民协’领导成员吴祖型、黄立群、达凤德、王琴舫等去找李先生的时候就更多了。”大家认为，当时尽管相符教授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他是以民盟盟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从未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以他的革命思想品格、能力和他在实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从而十分信服地把他看成是导师和领导者。

（三）积极为“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出力开拓新局面。

1944年，李相符加入“民盟”，正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时候。未改组前，“民主政团同盟”从组织内部存在三个问题：①由于“政团”二字的束缚，限制了

无党无派人士的入盟，妨碍了盟的发展，不能适应形势要求；②它是由不同政治主张、信仰的三党三派（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职教社、救国会、乡建派）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团联盟；③青年党会员在盟内占的比例大，由青年党总部代办、把持盟务的情况已日趋明显，在成都尤为显著，盟的政治方向难免发生偏差。

相符同志针对改组后的“民主同盟”面临的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盟的发展巩固与端正政治方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举事实如下：

1. 他努力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众多的进步青年入盟，为改变原民主政团联盟性质以及坚定盟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一支可靠的力量，其中最明显的如：

（1）1944年秋以后，李相符同志和唯民社的绝大部份成员都相继转入了改组后的“民盟”，为盟增添了一批有影响、有作为的领导骨干，先后被选为盟中央委员、省支部委员等职。有的本身就是中共老党员，有的则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爱国人士。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充实巩固了这个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保证它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2）1944年秋至1945年12月，相符同志先后动员了大批“民协”同志参加“民盟”。其中王晶珪、崔巍、黄寿金、陈鼎文、吴祖型、林梦奇、李景春、达凤德、何富华、赵锡华、罗承云、李惠明（渣滓洞牺牲的烈士）、张国维（渣滓洞牺牲的烈士）、刘淑文、商韬、胡忠植、孙跃冬、李江景、冯玉钦、汪寿康等众多“民协”同志的入盟，其好处有三：①使盟的活动不再局限于上层，它在青年中也扎了根，在开拓盟工作的新局面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②充实了盟内的重要力量，对巩固盟的组织，坚定盟的正确方向又增加了一层保障；③对“民协”来说，它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需要依托“民盟”，才能更好地开展斗争。这样，

相符同志就把民盟工作、民协工作以及育运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都结合了起来，为在爱国民主斗争中互相支援和密切配合，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另外，其他经相符同志介绍或受他影响吸收入盟者还不在少数。仅在1944年秋民盟在川大的组织成立后，最早由他介绍入盟的，在教职员中有张万禄、王道容、王拔群、向敦仁、李琼仪、李青匀等；学生中除“民协”的第一批外，我就是早期入盟者之一。在1945年和以后又陆续有所发展，加上上述同志和我又分别各自介绍吸收了一批盟员。因而解放前川大“民盟”的基础相当雄厚，追本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基本上是从相符同志开始奠基的。并在他的影响下，川大的地下党员、民协成员、民盟盟员在组织上互相交叉，亲密无间，在行动上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甚至把血都流在一起的有重庆渣滓洞、成都十二桥的一些烈士。在川大建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良好开端。

以上情况说明李相符具有高明的组织才能，他善于团结调动各方面的进步力量，努力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都充实到“民盟”内来。

1944年11月5日，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他当选为支部委员（也是组织委员之一）时，盟员还是有限的；成都约百人，重庆只80人。但是到1945年10月初，“民盟”召开临全大会（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盟员已发展到三千人（无其它党派的盟员约占70%），其中四川即达两千人，成都则约占一半。这就是说不到一年，成都的盟员就增加了10倍，占全国盟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这是“民盟”组织和盟内骨干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但相符同志所作的贡献，则是特别突出的。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和邓初民、冯哲民、沈志远、杨伯恺、曾庶凡等都被增选为盟的中央常务委员或中央委员，从而加强了盟的领导班子，扩大盟

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削弱青年党一度对盟务的把持，极大地促进了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2、他勇于与善于同青年党进行政治斗争。当时，四川乃是青年党的大本营，它在成都尤其跋扈专横，竭力把持盟务，特别是它历来就反共，因此在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以后，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复杂而尖锐的斗争，相符同志坚定地同盟内的进步势力一起，广泛团结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同青年党内的顽固份子展开了一步一步针锋相对的斗争。

（1）首先他对青年党内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团结工作。1944年秋冬在一批“民协”同志入盟后，相符同志即与他们筹商在盟省支部领导之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青年组织，以便团结青年党影响下的青年以及其他方面的青年，共同推进民主运动。到1945年2月底，“民协”方面就以王晶垚、贾唯英、宣世贤为代表，同青年党内的青年协商成功，在3月1日正式组成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民协青年社”，并创办了《民主青年》半月刊（四开铅印），由王晶垚任主编，其后，王离开成都，又由岳克、张学孔等继任主编。在“民盟”的省支部里便由相符同志领导这个青年团体。在嗣后不断兴起青运、学运中，就团结他们一道参加共同的斗争，削弱了青年党中反共的顽固势力。

（2）他对青年党中顽固势力把持盟务的歪风则极力抵制和坚决斗争。自1944年11月“民盟”的省支部成立以后，青年党内的顽固份子为把持盟务，排斥进步势力，一再制造摩擦，滋生事端，发展到1945年6月“民盟”的成都市分部筹备选举时，更是彻底暴露。本来，在省支部成立时，9个委员中青年党就占了3个（李璜、杨叔明、宋涟波），已不算少。因此在筹市分部时，与青年党商定：分部的委员仍按以比例选出。当时该党完全同意，并主动承担了发通知及会场事务。殊不知他们却耍了手脚，对其本党盟员的通知及早发出，对其他盟员的通知却延期发出。以致到